

第二届革命文物讲解展示交流活动

专业组

(20项,按行政区划排序)

芬芳——《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报》中的巾帼印记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妇女运动史和妇女解放事业的重要见证物，为一级文物，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和现实宣介意义。1949年由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编印，共发行7期，分别于1949年3月24日、3月26日、3月28日、3月30日、4月1日、4月3日、4月9日(终刊号)出版，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盛况的记录与见证。《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报》收录毛泽东同志“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题词，党中央贺电内容，见证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记录蔡畅、邓颖超等领导机构成员的选举过程，以及参会人员的构成情况(411名正式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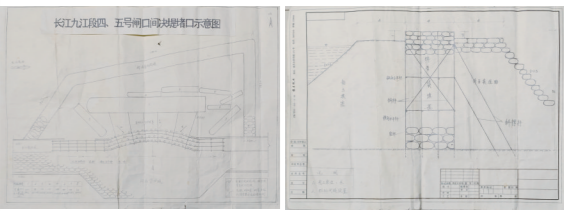
内藏乾坤 外铸忠诚
东北烈士纪念馆

抗日交通员张宗伟的藤条箱，长方形，通体灰黑，长69厘米、宽50厘米、高25厘米，箱体完好，箱内暗藏薄木板夹层，藏着烽火岁月的红色密码。从1933年起，张宗伟扮成商人，用这只藤条箱秘密文件，奔走于哈尔滨与上海列车间，藤条箱见证他以家为联络站，办秘密印刷厂的坚守，也亲历面对酷刑的坚贞。1948年，张宗伟妻子阿格拉非娜将箱子捐赠，虽然它已难去实用功能，但却成为不朽精神载体——是抗日志士用生命守护信仰的见证，是红色交通线的丰碑，更让“忠诚”二字在代代讲述中永远滚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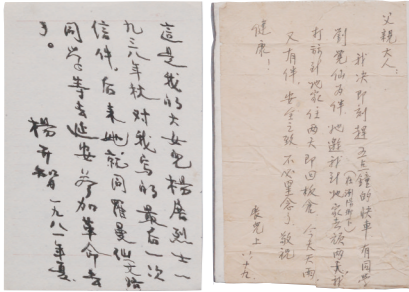
一张草图里的钢铁长城
九江博物馆

长江九江段四至五号闸口间决堤堵口示意图，长54.8厘米、宽39.6厘米，是1998年九江抗洪抢险的珍贵革命文物。它由原北京军区27集团军工兵团副团长高乃善组织绘制，经教导员李好军打印留存。2025年捐赠给九江市博物馆，图纸系统记录了“钢木土石组合坝”封堵技术的实战应用。1998年8月，该团奉命星夜驰援九江。战士们三人一组，在极端条件下搭人梯植桩，将10余米钢管插入地基，多人受伤，累晕仍坚守30小时，最终搭建起长55米、高7米的钢木框架，助力决口合拢。图纸不仅是抢险技术的实物见证，更承载着当年奋战在决口最前线官兵们所展现的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伟大精神，成为铭记九江抗洪、弘扬革命传统的重要红色印记。



革命后来人
长沙市博物馆

1938年，17岁的杨展目睹山河破碎，决心奔赴陕北投身革命，面对深爱的父亲，她写下“去浏阳乡下玩两天即回”的善意谎言，这一别竟成永诀。这份泛黄的家书，是革命烈士杨展留给世间最动人的红色印记。1941年，她在日军“铁壁合围”大扫荡中为掩护战友坠崖牺牲，年仅21岁。父亲杨开智苦等11年才得知噩耗。1981年，83岁的他将这封读了无数次的家书捐赠，让这份赤诚得以传世。这封家书，是杨展对父亲的诀别，更是对革命信仰的请战书。如今，它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以跨越时空的力量，指引当代青年读懂青春的意义，扛起时代的责任。



藤椅上的决胜时刻
西柏坡纪念馆

藤椅长96厘米、宽76厘米、高77厘米，木质结构，黄色藤皮编制。1947年4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解放井陉煤矿时，缴获了这把藤椅，它原为井陉煤矿资本家所有。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来到西柏坡后，中央机关就把藤椅送给他使用。当年毛主席经常坐在这把藤椅上办公、撰写文章，三大战役的许多电报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就是在这把藤椅上写就。1997年5月，这把藤椅经鉴定被定为三级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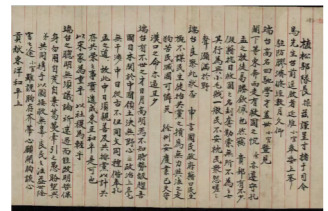
孤岛上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1939年7月，上海人民抗日活动中制发的“义卖救难”纪念章。铝制，圆形，正面中间长条衬底为白色，“义卖救难”为蓝色，长条两旁斜横条为红色，横条两边为白色斜横线，四角为蓝色衬底，反面为原皮色(黑色)，为一级文物。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一书第214页记载：“1939年下半年，‘义演’成为上海人民为第四军募款的主要方法，当时‘义演’活动几乎遍及上海工人、职员、学生、妇女各界，其中上海职业业妇女俱乐部推出的‘夏多物品慈善义卖会’和‘商业救亡协会’主办的上海业余话剧界救亡公演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



咫尺间的历史回响——两份档案与一个民族的光荣
山东博物馆

该文物为1939年山东桓台牛王庄战斗中，侵华日军某部松队长给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的对降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时任长山中学校长的马耀南收书，建立抗日救国联军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他率部纵横胶济铁路沿线，屡建战功，成为日军的眼中钉。对降书为纸质原稿，采用毛笔书写，落款为“松队长”信，信内容为“保全家庭”给予高官厚禄”为诱饵，企图诱降马耀南。信件充分暴露了日军在军事围剿受挫后，转而采用政治诱降的险恶用心。然而，面对对降书的威逼利诱，马耀南毫不动摇，以坚定信念作出最英勇的回应。该文物与馆藏《大众报·号外》(1945年日本投降消息)构成完整叙事，从日军“劝降”到“投降”，呈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艰难抗争到最终胜利的伟大历程。20世纪50年代，该文物由马耀南家属捐赠入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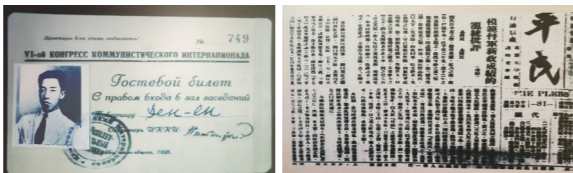
烽火中的工业南迁
重庆自然博物馆

天府煤矿孙越崎办公室旧址，位于重庆北碚后峰岩，是一栋朴素的凹字形平房，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此处182平方米的建筑，是一部静默的史书。1937年抗战爆发，时任中福煤矿总经理的孙越崎在此力排众议，作出了“全部迁走，为我所用”的关键决策，将关键设备千里西迁。1938年2月，最后一列设备车在黄河桥头上演“生死五分钟”，千钧一发惊险险通过，保住了民族工业的火种。这批设备最终经北川铁路运抵北路，使天府煤矿产量激增，成为支撑战时重庆能源供应的“抗战堡垒”。如今，旧址内设有主题展览，向世人讲述这段实业救国的传奇。它见证了从中国工业从守旧到开明到定义标准的百年长征，其承载的自立自强精神至今仍激励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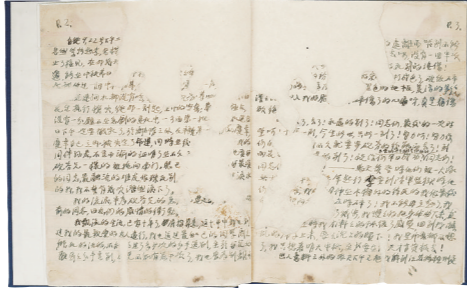
“虎啸”传天火 山河证初心
大同市博物馆

两件文物诉说着革命先驱王振翼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一件是1921年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发给王振翼的录取通知书，见证了他在个人前程与国家命运间的毅然抉择——放弃锦绣坦途，投身救国洪流，成为山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另一件是他创办并化名“虎啸”发表藏文的《山西平民周刊》(后更名《平民》周刊)，这些泛黄的纸页是他以笔为矛，唤醒民智，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的直接见证。通知书象征着“舍”，周刊代表着“为”。一舍一为之间，勾勒出王振翼以天下为己任的赤诚初心与实干担当。他们铭记着王振翼如星火般的人生；虽仅有30年，却以“虎啸”之姿劈开黑暗，用青春点燃了燎原的革命烈焰，其精神魂魄千秋永耀。



19岁的狱中绝笔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死前日记》是一部反映早期共产党人狱中斗争的珍贵史料，是雨花英烈贺德麟于1928年9月28日至10月5日临刑前一周写下的。为纸质，长20.6厘米、宽16厘米、厚0.5厘米，为一级文物。1928年7月，中共南京党组织遭到第三次大破坏，贺德麟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写下了《死前日记》等8册笔记，详细记录了狱中的黑暗生活和被捕人员的表现。《死前日记》记录了他“从一个英雄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思想历程。临刑前，他让狱友刘德耀把日记交给党组织，刘德耀不负重托，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记被辗转送至雨花台烈士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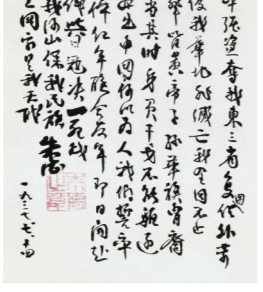
抗战烽火中的“武汉辛德勒”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武汉东湖卫生疗养院旧址始建于1935年，坐落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畔，原为一处设施完备的医疗康复场所。1938年武汉沦陷后，这里成为重要的医疗救护与难民庇护所，见证了美国医务工作者鲍因顿的人道主义善举。鲍因顿以此为基础，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粮食救助、疫病防治、安全庇护，还开设简易课堂传授知识，累计援助难民超2万人。在战火中为民众撑起一片生机。如今，这里是武汉重要的抗战遗址，承载着烽火岁月里跨越国界的善意与坚守。



朱德抗日誓词——以天职铸忠诚 拼热血护家国
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

这篇诞生于1937年7月14日的抗日誓词，是朱德同志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七天亲笔写下的战斗檄文，字里行间雕刻着民族危亡之际的使命担当。彼时，日军铁蹄踏踏华北，覬覦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形成，朱德以红军总司令之名，挥笔立下“不能驱逐日寇，中国，何以为人”的铿锵誓言。誓词中“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的誓词，既是红军将士的出征宣言，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坚定立场。此后，朱德率领改编后的八路军东渡黄河，指挥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诸多战役，用实际行动践行“复我山河，保我民族”的誓言。这篇手稿不仅是朱德同志军事思想与爱国情怀的集中体现，更见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浴血抗争的精神丰碑，至今仍激励着“保卫国家，是我天职”的时代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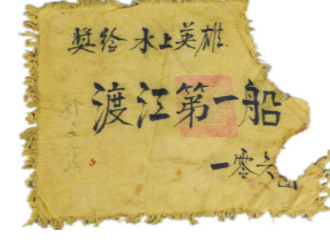
黑陶罐见证的荣耀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黑陶罐通高28厘米，口径12.1厘米、底径14.6厘米、盖高10.5厘米、口径9厘米，陶质，通体黑色，底足到腹部渐宽，颈部回收直口圆唇，盖为斗笠状，顶为宝珠状，口沿有残缺。为抗日战争时期，凌源市河坎子乡山庙子村民为抗联战士送饭时使用，是东北地区军民一心抵抗日寇侵略的重要见证。陶罐原藏于辽宁省凌源市博物馆，1998年3月由辽宁省凌源市博物馆移交。



人民的渡江·人民的胜利
渡江战役纪念馆(人民纪念馆)管理处

这面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颁发的荣誉锦旗，黄色，长20厘米、宽12厘米，锦旗上方雕有“奖给水上英雄”，中部核心位置是“渡江第一船”五个醒目大字，右侧落款为“一零六团”。锦旗的主人是渡江战役亲历者陈正华，它是陈正华参与战役的直接物证，也是战役历史的重要见证。1949年4月渡江战役发起时，陈正华作为人民解放军某部突击船成员，承担前线渡江突击任务，他所在的船只在渡江作战中，克服长江江宽流急、敌人火力封锁等困难，率先成功抵达长江南岸，为后续部队登陆开辟了关键通道，为表彰这一功绩，其所属部队一零六团专门授予该锦旗。此锦旗不仅是陈正华个人英勇表现的表彰，更反映了渡江战役中突击部队的作战特点。



八口之家的热血长征路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

2020年，湖南张家界侯家人向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捐赠两张《革命烈士证明书》，经鉴定为三级文物，尺寸均为长49.8厘米、宽35厘米，属于近现代纸质革命文物。《革命烈士证明书》印证了侯清芝一家八口同长征的热血壮举。1935年，侯清芝带领全家毅然跟随红二、红六军团踏上长征路，途中父亲、叔叔、妻子、妹妹相继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家失散的亲人陆续团聚，让这段长征故事多了温情回响，更生动诠释了不朽的长征精神。这两份证书佐证了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史实，是长征精神的鲜活载体，激励着后人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前行，具有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闪耀的红星 不朽的经典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珍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的《西行漫记》为二级文物，长22厘米、宽15厘米。由上海复社1938年出版，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名《红星照耀中国》)的首个中文全译本。2016年由海伦·福斯特·斯诺好友提姆·康西丁捐赠。这本书向世界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自问世后便风靡全球。1938年2月，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以“复社”名义将该书译成中文，作为掩护，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出版。许多爱国青年阅读此书后，纷纷通过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远隔重洋的呐喊——一份报纸与一段不朽的抗战史诗
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

《救国时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的海外抗日机关报，其前身是1935年5月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报》，同年12月更名后创刊，1938年2月出至152期暂停，现存144期。该报由莫斯科编辑，巴黎出版，利川市档案馆馆藏版本入选湖北省档案文献遗产，是珍贵红色档案。它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核心，70余期都报道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事迹，刊载大量义勇军捷报与抗联文告。是最早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披露南京大屠杀的中文报纸之一，还刊载有毛泽东抗日主张等重要内容。报纸发行覆盖43个国家，最高发行量达2万份。它为海外侨胞与国内军民搭建起抗日信息桥梁，见证全民族抗战初期宣传历程的重要实物，具有较高的官方史料与文物价值。



吃水不忘挖井人——瑞金红井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搬迁到沙洲坝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元太屋办公和居住，他发现这里的群众喝水的是池塘里的脏水，便把解决群众喝水难的问题挂在心上，只要一有空，他就叫警卫员小吴拿着如何为群众挖井的事。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没几天水井挖好了。为了使水井清澈，毛主席又亲自下井底挑沙子、垫木炭。毛主席用实际行动，为机关干部和群众树立了榜样，中央各机关掀起了开挖水井的热潮，沙洲坝人民由此结束了饮用脏水体的历史，喝上清甜甘甜的井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洲坝人民将这口井进行全面整修，并取名为“红井”，在井旁立上一块碑，刻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14个赤金大字，以此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爱戴和思念。



一架值得铭记的飞机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刘少奇故里管理局)

1959年，中国向苏联购买了5架飞机，编号为240的伊尔18型飞机，用来服务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1963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乘坐这架飞机出访东南亚四国。1963年4月26日，距离刘少奇到访日期只剩五天，一封密电被破译，敌人在车队经过的路上挖了一条道路，埋上炸药，只要一按电钮就会瞬间爆炸。4月28日夜，一场抓捕行动悄然进行，正在睡梦中的国民党特务来不及反抗，就被荷枪实弹的军警制服。在地道中，警方还发现整整两箱TNT炸药和一箱雷管。此时，距离刘少奇到访金边，只有5个小时。5月2日清晨，伴随着伊尔18—240巨大的螺旋桨轰鸣声，刘少奇如期到訪金边，西哈努克亲王携王后到机场迎接。这一史实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艰辛历程，承载着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外交事业的理想与追求。



秤锤“历史见证·精神承袭”
南梁革命纪念馆

1934年11月7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华池县南梁地区创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中国西北地区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的诞生，边区政府设立南梁集市，规定每月“逢一集”，因边区百姓当时使用的旧制秤度量衡过程换算复杂，货币市场混乱，边区政府研究决定制作新制市斤秤锤来统一度量衡。南梁革命纪念馆陈列陈铸市斤秤锤实物，并印制作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首任主席、曾参与主持制定边区多项政策，多年后他领导广东革命开放时，秉承这一务实精神，提出经济特区设想，实现了陕甘边区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实践。



第一届革命文物讲解展示交流活动精品项目

本版责编：何薇 甘婷婷 王龙霄
版式设计：焦九菊

志愿组

(10项,按行政区划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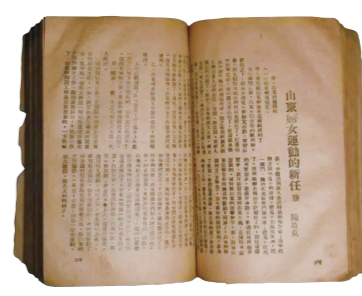
梦潮剧社的徽章
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

闽南梦潮剧社从诞生到被迫解散的四年轻程，在民族危亡之际，梦潮剧社以戏剧为尖锐武器，以舞台为前沿阵地，活跃于城乡之间，在城乡开展抗日宣传、凝聚统战力量的革命实践。他们排演进步剧目，将抗日救亡的呼声传遍街头巷尾；剧社深入群众，用创作抗日戏剧演绎家国苦难，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透过这枚古老的徽章，彰显了剧社作为闽南重要革命文化力量的使命与担当，也让人深刻感受到，红色文艺在峥嵘岁月中如何以鲜活可感的方式，成为照亮黑暗、凝聚人心的熊熊火炬。这份记忆，历久弥新；这种精神，永续传承。



英雄母亲陈若克
山东博物馆

该馆收藏的1941年《联合大会特刊》，记录了一段重要的山东抗战历程。1940年，在侵华日军频繁扫荡的艰难形势下，山东省联合大会于沂南县青驼寺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和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省级政权的建立，统一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形成。妇女代表陈若克出席了此次大会，并当选为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她在会上作了题为《山东妇女运动的新任务》的报告，系统总结了1938年至1940年间山东妇女工作的开展情况，并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妇女工作的多项任务，普遍深入地开展妇女运动，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建立健全各级妇女组织，广泛发动妇女投身抗战等。这份报告立足实际，指向明确，统一认识，促进全省妇女工作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



十三岁少年的作文本
浏阳市博物馆

作文本长23.8厘米、宽13.5厘米，是寻淮洲就读于金江高小时使用的作文本。封面有“莲溪小学高等小学校”的字样和寻淮洲的签名，内容为他读书时书写的作文。作文本中既有“我们生在世界上，假使和那寄生虫一样……由幼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空过这一生，岂不是太无意义吗？”的追问，也有“与国家做些大事”的决心，此时的寻淮洲年仅13岁，却已经有了如此宏大的志向。后来寻淮洲投身革命，屡立奇功，21岁便担任了红军军团团长的职位，成为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真正实践着自己“为国家做些大事”的理想。不幸的是，1934年在潭家桥战斗中，寻淮洲指挥部从同僚倍信于己之故展开激战，腹部中弹，壮烈牺牲。临阵前，他要求将自己的衣服留给给战士，成为赤身下葬的军团长。



从课堂走向文化抗战的“前线”：凌伯骥
广州博物馆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六烈士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内。烈士墓平面呈方形，占地面积96平方米，墓群材质为花岗岩。主墓群两侧是刻有烈士简介与烈士墓志的石碑，墓三面以低矮的石栏杆围护，中间为主通道，内两侧则各置一形石凳。墓内埋葬着凌伯骥等“广州文总”六位烈士的骸骨。2009年7月，六烈士墓被公布为广州市天河区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成立于1933年4月，下设“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凌伯骥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为广州分盟负责人之一。1934年1月，凌伯骥等六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8月1日英勇就义。他牺牲时未满20岁，是六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擎团旗筑旗 筑共同体梦想
云南农业大学

1950年10月18日，由云南省丽江各民族代表敬献的锦旗，见证着边疆民族团结，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锦旗以正红绸缎为底，烫金字体，正中醒目标书“敬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走”的标语，尽显丽江各民族人民对领袖的衷心拥戴与紧跟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画面不仅有规整的汉文，还精心篆刻纳西东巴文、彝文、傈僳文等十余个民族文字，同时逐一列出纳西、藏、怒、傈僳等20余个民族称谓，呈现出丽江地区多元交融的民族构成格局。作为边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画面不仅有规整的汉文，还精心篆刻纳西东巴文、彝文、傈僳文等十余个民族文字，同时逐一列出纳西、藏、怒、傈僳等20余个民族称谓，呈现出丽江地区多元交融的民族构成格局。作为边疆

敬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
毛澤東主席
我們永遠跟着你走
雲南省各民族代表敬献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八日

那抹红 从1927到今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起义期间，红领带与带红十字标识的马灯是起义军极具特殊意义的标识文物。因起义军与敌军同属国民革命军，军服样式一致，为在漆黑战场和枪林弹雨中快速分辨战友，战士们以胸前佩戴红领带、马灯玻璃上红十字为识别标志。红领带并非随意选择，在传统战士文化中它是新生的象征，在战场上更是战士们对旧时代的决绝告别，承载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信仰宣言。这些简易标识既作为携带隐蔽，又醒目易辨，成为起义军团结作战的“暗号”。见证“战士们”生死与共”的信任与危难时刻的智慧勇气，是红色基因的具象载体，生动诠释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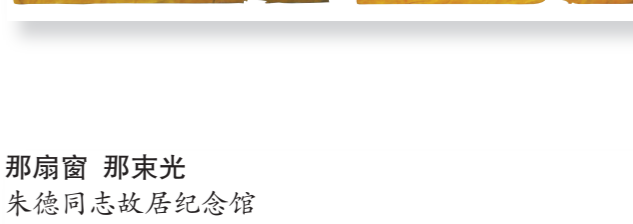
歌声回响——抗战歌集《大家唱》
武汉革命博物馆

抗战歌集《大家唱》，由曾昭正、李行夫编选，第一集(初版)于1937年10月，由汉口音乐歌咏队、武昌群声歌咏队、武汉大学歌咏队联合出版，第二集(初版)于1937年11月出版，为三级文物，长18.5厘米、手掌大小。2015年由武汉小吃老字“老道城”创始人曾厚诚的长孙、合唱队主唱之一曾昭正之子曾宪德捐赠给武汉革命博物馆入藏。凌星海为《大家唱》第二集作序，并把自己写的许多作品发表在《大家唱》上。《大家唱》出版后，武汉青年人手一册，书店很快销售一空，在全国发行量达20多万册，成为救亡运动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歌曲集之一，有力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救亡运动。



墙缝中的深情——杨开慧书里的革命信仰
杨开慧纪念馆

这封泛黄破旧的书信是杨开慧于1927年秋秋起义后，藏于长沙板仓老家卧室墙缝中的绝笔。彼时她与毛泽东失去联系，在白色恐怖中独撑家庭，坚持斗争，将对爱人的思念、对革命的赤忱，悉数凝于笔端。家书中，“我要哭了”的哽咽，是对伴侣刻骨铭心的眷恋；“死不足惜”的铿锵，是对共产主义信仰至死不渝的坚守。儿女情长与革命斗争在此交融，她眷恋“小家”的烟火温情，更以生命践行“大家”的使命——用柔肩扛起重担，以热血浇筑理想的精神。这封未寄出的信，是革命年代的情感孤本，更是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写照。它在墙缝中沉默数十年，却在历史长河里永远激荡着信仰的力量，见证着一位共产党员对爱的忠贞、对信仰的赤诚，让后人读懂：真正的信仰，从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坚守与牺牲。



那扇窗 那束光
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

朱德同志旧居阁楼上，有一扇由他亲手凿开的方窗。这扇窗折射出朱德同志早年思想觉醒与革命初心萌动的宏大历史进程。讲述者从儿童的视角，融入“五星琳琅山”这一本土意象，以青春化、故事化的语言，赋予革命文物以情感温度与时代气息，让红色历史真正“活”起来，让精神之光“照”进人心，它巧妙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将朱德个人的奋斗精神与当代“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相衔接，有力传承了红色基因，激励了时代新人，实现了文物讲解、历史教育与精神激励的有机统一。



篆刻在印章里的记忆——漫画泰斗华武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文书上”印章，长5.1厘米、宽1.5厘米、高3.8厘米，漫画家华君武于2000年捐赠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据华君武回忆：“1938年11月，我经李克农同志写信给林伯渠同志，介绍我去延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给开了护照。因为我从上海来，不像个当兵的，所以我的职务是八路军文书上。现在我任作画人请人刻了一块印章‘八路军文书上’以志纪念。从此我就走上了革命之路。也因此我对八路军办事处还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怀念。”

